

论临桂词派在清代词派发展中的定位及其意义^{*}

——“临桂词派”系列研究之五

张利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临桂词派需要在清词三期及其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比较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定位,也需要在晚清词坛流派纷呈、社团林立的社会时代大环境中定位,立足于临桂词派渊源、命名、领袖、团队、宗旨、纲领及其理论基础等文学流派构成要素的研究,才能认识临桂词派对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超越和创新,也才能更好理解临桂词派作为文学流派的价值作用,确立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临桂词派;文学流派;清词三期;宗旨纲领;词学地位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5)01-0017-07

广西在近代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与晚清粤西文化自觉与自信意识萌发息息相关,也与粤西文学崛起及其临桂词派主盟晚清词坛的作用影响有着密切联系。临桂词派又被称为桂派、粤西词派、广西词派,是指以广西临桂人王鹏运、况周颐为首,以临桂及广西籍词人为核心,以王鹏运标举“重拙大”之旨和况周颐《蕙风词话》词学理论为总结,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词人,主盟当时词坛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包括临桂及广西籍词人刘福姚、邓鸿荃、阳削、倪鸿、龙继栋、韦业祥等;外省籍词人文廷式、朱祖谋、易顺鼎、易顺豫等,对晚清词学复兴与发展发生重要作用,对当时词坛产生重大影响。

将临桂词派放置在清代词学发展及清代词派间性中来定位,这既有利于临桂词派的渊源、传承、流变、发展脉络和过程的研究,也有利于更好把握临桂词派的地位、作用、影响、价值和意义,更有利于从间性理论方法视角系统考察清代词派间关系及其整体结构和脉络,从而拓宽临桂词派研究广度和深度。因此,从清代词派发展及其文学流派视角探讨临桂词派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必要

的,也具有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临桂词派在清代词派及其清词发展格局中的定位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以“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提出“楚之骚,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之观点,此后明清小说兴起,但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正统、主流观念影响下,并未登上大雅之堂,明清文学主流可谓诗词文发展的延续。

词自宋至元明清发展,由盛而衰,但在清代形成中兴之势。叶恭绰曰:“词学滥觞于唐,流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2]陈匪石亦曰:“词肇于唐,成于五代,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复兴于清”^[3]。这已是近现代以来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当代词学研究虽然重点在宋词,但近年来清词研究逐渐升温,清词在词史及词学史中的地位也在逐渐提高,甚至形成清词研究的热点。“清词研究丛书”主编张宏生认为:“词兴起于唐五代,大

[收稿日期] 2014-08-26

***[基金项目]**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12&ZD164)

[作者简介] 张利群(1952—),男,湖北罗田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古代文论、桂学研究。

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而又复振起于清代。清词接武两宋,踵事增华,不仅有继承,而且有发展,成为词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他还从词派发展角度认为:“清代词派纷呈,迥异前代。自明末陈子龙创立云间词派,流风所及,主宰顺治一朝。康熙年间,阳羡、浙西二派高标并举,陈维崧、朱彝尊领袖词坛,使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八九’(谭献《筐中词》二),而浙派影响尤大。嘉道间,张惠言兄弟《词选》出,创立常州词派,经过周济、谭献为之揄扬,每变愈上,不仅在清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降及近现代词坛,亦每见其流风余韵。而属于上述流派又加以变异者,或不属于特定流派而自出机杼者,亦复不少。”为此,他还列出具体数据予以实证:唐代计有词人 170 余人,词作 2 500 余首;宋代计有词人 1 430 余人,词作 20 860 余首;金代计有词人 70 人,词作 3 570 余首;元代计有词人 210 人,词作 3 720 余首;明代计有词人 1 860 余人,词作 25 000 余首。而清代仅顺治、康熙两朝词人,已达 2 500 余家,词作 60 000 余首。准此而论,清代词人当在 1 万以上,词作当在 25 万首以上^[4]。当然,这或许与清代距今较近和较为重视总结和积累有关,也与清代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集大成时期,较为重视文献典籍收集整理和注重文献研究方法有关,诚为清代文学风气及其文学研究风气和学术风尚使然。

清代词学复兴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词学流派纷呈,社团林立。撮择其关键,梳理其脉络,主要为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临桂词派三大词派,亦可划分为清词三期。三大词派既为清词主流,构成整体结构的三足鼎立之态,又形成历时性发展中的逐次递进之势。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兴起于康熙、乾隆间,主张词的清空醇雅而内容渐趋空虚狭窄,至嘉庆以后逐渐衰落;继而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兴起,反对无病呻吟,强调比兴寄托,至光绪以后逐渐式微;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代表的临桂词派于光绪年间异军崛起,在众多流派中独树一帜,主盟晚清词坛,所标举“重拙大”之旨,不仅为常州词派后劲,而且有所超越创新。蔡嵩云《柯亭词论》曰:

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同时。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常州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振北宋名家之绪,以立意为本,以叶律为末,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

庵戏称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郑叔问、况蕙风、朱疆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之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本,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唯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不同,而词派则同^[5]。

清词三期之论大体反映清代词学发展概况和脉络,三期均以词派为代表和标志作表征,足见文学流派对清词发展的推动作用。

清词第一期是康熙年间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为代表。浙西词派又称“浙派”,因其领袖朱彝尊为浙西人(秀水,今浙江嘉兴)得名,主要成员有厉鹗、项鸿祚,以及与朱彝尊并称为“浙西六家”的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祥麟等。朱彝尊辑《词综》,著《曝书亭集》,奉姜夔、张炎为词坛正宗,提倡“醇雅”,反对“硬语”、“新腔”,认为“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紫云词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其“疏中有密,独出冠时”,但“微少沉厚之意”,病其词缺失寄兴深蕴,严苛声律,偏重雕凿,过分追求技巧形式而忽略思想内容。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评曰:

浙派词,竹垞开其端,樊榭振其绪,频伽畅其风。皆奉石帚、玉田为圭臬,不肯步入北宋人一步,况唐人乎!

由此可见朱彝尊及其浙西词派虽然影响很大,但其弊端和不足显而易见,流风所至,影响清词坛萎靡不振,词风清空纤弱,词派影响逐渐衰落。

清词第二期是嘉庆年间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为代表,因创始人张惠言为江苏常州武进人得名。徐珂《近词丛话》曰:

浙西派始于厉鹗,……鹗词宗彝尊,而数用新事,世多未见,故重其富,后生效之,每以据摭为工,后遂浸淫而及大江南北。然钞撮堆砌,音节顿挫之妙,未免荡然。惠言乃起而振之,与其弟琦选唐宋词四十四家百六十首为《词选》一书,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附景物,张皇幽渺,约千篇为一简,蹙万里于径寸。……其友人恽敬、钱寄重、丁履恒、陆继格、左辅、李兆洛、黄景仁、郑善长辈,亦皆不愧一时作家。其学于惠言而有得者,则歙县金应成、金式玉也。其以惠言之甥

而传其学者,则武进董士锡也。荆溪周济友于士锡,尝谓“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其所论也,实足推明张氏之说而广大之,所著《味隽斋词》及《止斋词》,堪与惠言之《茗柯词》把臂入林^[6]。

常州词派为纠正浙西词派的清空纤弱、狭窄空虚的词风而兴起,一反浙西词派宗姜夔、张炎之风,“周氏退姜张而进辛王,尊梦窗以当义山,昌谷其所以标异于浙派者,岂非置重于‘意内’,以权衡其‘言外’,诸诸乎焉,有国史吟咏之志者哉!”常州词派强调“意内言外”,注重比兴寄托,影响一代词风,余绪一直延续至清末。

清词第三期是光绪年间以王鹏运、况周颐为领袖的临桂词派为代表,因王、况均为广西临桂人而得名。他们相继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组织词社,唱和酬答,形成主盟晚清词坛之势,对词学复兴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对当时词人发生重要影响。龙榆生《论常州词派》曰:

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言)、翰风(琦)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字保绪)氏,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字幼遐)、归安朱疆村(孝臧,原名祖谋,字古微)诸先生,流风余末,今尚未衰歇^[7]。

叶恭绰《广箇中词》曰:

幼遐先生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疆村翁学词,实受先生引导,文道希之词,受先生攻错处,亦正不少^[8]。

王鹏运对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文廷式等词人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临桂词派领袖和核心。王鹏运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朱祖谋《半塘定稿序》),论词标举“重拙大”之旨;况周颐词“寄兴渊微,沉思独往,足称巨匠”(叶恭绰《广箇中词》),其《蕙风词话》对“重拙大”进行理论阐释和发展,系统构建词心、词体、词格、词法、词径、词律等理论体系,提倡“静穆”之词境,为临桂词派的理论纲领和实践总结。

由此可见,清词发展呈现出流派纷呈、潮流峰涌、词家云集、词作众多的基本状况,临桂词派在清词发展进程中及其清词三期格局中确立其定位。一是思潮流派逐层递进发展,浙西词派以其清空醇雅扭转清初词坛萎靡之风;常州词派以其比兴寄托反拨浙西词派衰落之势;临桂词派以其“重拙大”弥补常州词派不足,形成对以往流派的

超越和集大成发展态势。二是临桂词派既传承弘扬历代词派传统,又能够纠正和弥补各词派之不足,独树一帜地创新发展,推动晚清词学振兴,取得词学理论与实践的成就。三是以临桂词派主盟晚清词坛标志粤西文化及其文学自觉和自信,对于地域流派发展及其研究不失为重要意义。

二、临桂词派对常州词派的传承、发展和超越

临桂词派与常州词派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都力图纠正清初词坛绮靡逸乐之风,也力图纠正浙西词派清空纤弱之风,在推尊词体及其对宋人的取法上有着一些相同和相似之处。故而,后人往往将其视为常州词派余绪,并非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词派,从而也忽略两者的差异性,更未能把握临桂词派对常州词派的发展和超越之处,无法准确确立其作为词派的地位、作用与价值。尽管常州词派余绪在清末还有影响,也会影响到临桂词派及其词人,但张惠言、周济之后真正能够传承常州词派衣钵的是浙江杭州人谭献,他将王鹏运、况周颐词收入《箇中词》,曰:“后起有王幼遐、况夔笙,宫商举应,伶翟争传已。”^[9]徐珂《近代丛话》亦在论述光绪朝词人时曰:“其效常州派者,光绪朝有丹徒庄棫、仁和谭献、金坛冯煦诸家。”“光宣间之倚声大家,则推临桂王鹏运、况周颐、归安朱祖谋、汉军郑文焯。”^[10]巨传友以之认为:“徐珂是宗奉常州词派的,他也看到了王、朱、郑、况等四大词人在光绪年间的巨大影响,但没有把王鹏运、况周颐等四人与谭献、庄棫并列入‘效常州派者’之中。徐珂之所以将他们分开叙述,是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实在已无法硬把王鹏运等人归于常州词派的大旗之下了。”^[10]更何况临桂词派不仅与常州词派有差异,而且对常州词派的一些弊端和不足进行批评,有所超越和创新,独树一帜,彰显出独立性及其特色。

其一,在传承弘扬常州词派倡导“寄托”基础上有所超越创新,对“寄托”之不足进行批评和反拨。《蕙风词话》^[11](以下此书引文不再出注)卷五第32则曰:

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则是门面语耳,略无变化之陈言耳。于无变化中求变化,

而其所谓寄托，乃益非真。昔贤论灵均书辞，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发，而不可以为训。必非求变化者之变化矣。夫词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尝有寄托，何尝不卓绝千古；何庸为是非真之寄托耶？

又况周颐《词学讲义》曰：

词，说文：“意内而言外也。”意内者何？言中有寄托也。所贵乎寄托者，触发于弗克自己，流露于不自知，吾为词而所寄托者出焉，非因寄托而为是词也。有意为是寄托，若为吾词增重，则是惊乎其外者，近于门面语矣^[12]。

此则显然针对常州词派领袖周济“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论而言，在肯定“词贵有寄托”基础上，对“寄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纠正“寄托”说的某些偏颇和不足。首先，认为“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强调出自真情实感、自然而然的寄托，而非人为做作、牵强附会的寄托，词创作不能为寄托而寄托，关键点在于区分寄托的自然性与人为性的差异。其次，指出“身世之感，通于性灵”，词之本体在于“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济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蕙风词话》卷一第1则）；而“寄托”则为陶写“性灵”之工具方法，如何能“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将“寄托”视为本体目的呢？关键点在于区分词创作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的差异。再次，寄托应该有所变化，不能“千首一律”，成为“略无变化之陈言”，更非“于无变化中求变化”的所谓“乃益非真”的“寄托”，确定了寄托的变化性和真实性，关键点在于区分词的独创性和雷同性。最后，应该根据表达对象和创作需要运用寄托方式，而非一味盲目追求寄托或“呆寄托”，不能仅仅以寄托作为衡量词之优劣的标准，并非有寄托就是好词、无寄托就是劣词，关键点在于区分词之优劣不能仅仅以寄托为标准。

同时，临桂词派对“呆寄托”之弊进行批评。《蕙风词话》卷五第38则曰：

问：咏物何始佳？答：未易言佳，先勿涉呆。一呆典故，二呆寄托，三呆刻画，呆衬托。去斯三者，能成词不易，矧復能佳，是真佳矣。题中之精蕴佳，题外之远致尤佳。自性灵中出佳，从追琢中来亦佳。

又，卷一第33则评曰：

名家作词，题中应有之义，不妨三数语说尽。自余悉以发抒襟抱。所寄托往往委屈而难明。长言之不足，至乃零乱拉杂，胡天胡

帝。其言中之意，读者不能知，作者亦不蕲其知。以谓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发、而不可以为训，则亦左徒之“骚”“些”云尔。夫使其所作大都众所共知，无甚关系之言，甯非浪费楮墨耶？

所谓“呆寄托”指为寄托而寄托之弊，其后果一是造成人为做作、牵强附会的虚情假意，有损文学表达的自然性和艺术真实性；二是“零乱拉杂，胡天胡帝”，缺乏思维逻辑、事理逻辑、情理逻辑与形象逻辑；三是“其言中之意，读者不能知，作者亦不蕲其知”，可谓王国维批评的“隔”，无法达到应有的创作、欣赏效果；四是“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发”，寄托失度，就会有失词学之道，更有失儒家文化及其传统文化之道；五是“使其所作大都众所共知”，千篇一律而缺失文学的独创性和创作个性。这足以说明，常州词派强调“寄托”虽然是针对浙西词派的清空纤弱之弊有感而发，对其弊端是一个反拨和纠正，但将“寄托”推到极端而失度，矫枉过正而留下弊端；临桂词派能够对其不足和缺陷进行批评，以期纠正“呆寄托”之弊，既表现出临桂词派与常州词派的差异性所在，也凸显出临桂词派能够扬长避短，对常州词派的“寄托”说进行了超越和发展。

其二，在传承弘扬常州词派“意内言外”说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发展，凸显“词境”、“词心”之意境的重要性。常州词派领袖张惠言提出“意内言外”，显而易见是在强调内大于外、意先于言、内容重于形式的观念，以纠正浙西词派内容空虚、形式浮华之弊，临桂词派执肯定和认同态度。《蕙风词话》卷一第58则曰：“乃若词以人重，则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又，卷四第1则曰：“意内言外，词家之恒言也。”但况周颐并未将“意内”仅仅作“寄托”理解，而是扩展“意”作为立意、意蕴、意韵、意境的内涵和外延，《蕙风词话》卷一第45则提出“妙造”之意：

作词不拘说何物事，但能句中有意即佳。

意必已出，出之太易或太难，皆非妙造。难易之间，消息存焉矣。

又，卷三第3则评曰：“淡淡着笔，言外却有无限感怆。”第13则评曰：“曲折而意多，意之曲折，由字里生出，不问矫揉钩致，不堕尖纤之失。”第22则中评曰：“取神题外，设境意中。”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况周颐由“意”至“境”，将“意”扩展为意境，提出“词境”说，将意、情、景、物、事、人有机统一。卷一第26则曰：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杯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怅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无,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

由“词境”至“词心”,由此对“意内”阐释更为深入丰富。卷一第27则曰: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吾心为主,而书卷其辅也。书卷多,吾言易出耳。

更为重要的是在“词境”、“词心”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浓而穆更难。知此,可以读《花间集》。”(卷二第1则),并将其与“重拙大”包容会通,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意境说理论。

其三,强调“备调守律”的重要性,从词作为“倚声”以凸显其声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词的艺术形式价值作用的本体论意义。况周颐在临桂词派中以严守声律而著称,故而被称为“况古人”。他提出“以备调守律为主旨”,突破和超越了“言外”之论。《蕙风词话》卷四第1则曰:

意内言外,词家之恒言也。《韵会举要》引《说文》作“音内言外”,当是所见宋本如是。以训诗词之词,于谊殊优。凡物在内者恒先,在外者恒后。词必先有调,而后以调填之。调即音也。亦有自度腔者,先随意为长短句,后勰以律。然律不外正宫、侧商等名,则亦先有而在内者也。凡人闻歌词,接于耳,即知其言。至其调或宫或商,则必审辨而始知。是其在内之微也。唯在内而难知,故古人云知音者希也。”

又卷一第34则曰:

畏守律之难,辄自放于律外,或托前人不专家,未尽善之作以自解,此词家大病也。守律诚至苦,然亦有至乐之一境。常有一词作成,自己亦既惬意,似乎不必再改。唯据律细勘,仅有某某数字,于四声未合,即姑置而过存之,亦孰为责备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松一字,循声以求,忽然得至隽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绝警之

句。此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如何!虽剥珉出璞,选薏得珠,不逮也。彼穷于一字者,皆苟完苟美之一念误之耳。

况周颐强调严守词律的重要性,而且也以之律己和律人,临桂词派这一特点影响到诸词人。徐珂《近代丛话》载:

光绪庚寅辛卯间,况夔笙居京师,常集王幼霞之四印斋,唱酬无虚日。夔笙于词不轻作,恒以一字工,一声之合,痛自刻绳,而因之以绳幼霞。幼霞性虽懒,顾乐甚不为疲也。己亥,夔笙客武昌,则与程子大以词相切磋。幼霞闻之而曰:“子大词清丽绵至,取径白石、梦窗、清真,而直入温、韦,得夔笙微尚专旨以附益之,宜其相得益彰矣。”^[6]

又,张尔田《词林新语》载:

临桂王右遐于蕙风为前辈,同直薇垣,研讨词事。右遐每有所作,辄就蕙风订拍,蕙风谨严,屡作为之屡改,半塘或不耐,于稿尾大书,“奉旨不改了”。

可见,况周颐严守声律的特点形成其词学思想发展以及严谨负责的创作态度,连王鹏运也受到他严守词律的影响,成为临桂词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及其诸词人共识。

三、临桂词派作为文学流派的特点及其意义

相对而论,临桂词派对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更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特征和意义。这不仅仅是表现在晚清至近代以来词学家名之曰“临桂词派”、“桂派”、“粤西词派”、“广西词派”等命名上,而且体现在临桂词派更为吻合文学流派的基本性质特征上。这主要体现在五方面。

其一,结社抱团,组织词社,聚集词友,唱和酬答,具有社团性质特征。最初主要通过当时在京为官、时任户部尚书的临桂人龙继栋的寓所“觅句堂”为集结形式和活动方式,以此集聚以桂籍士人为核心的文友,包括唐景崧、韦业祥、裴景福、谢元麟、王鹏运等,形成当时京师著名的文学圈子;其后王鹏运、况周颐等组织参与名震京师的宣南词社,王易曰:

清末词人聚于都下者有宣南词社之集,名流唱和,盛极一时,而国事日非,朝政益紊,往往形诸咏叹,宛然《小雅》怨诽之音。其有集著于世者如盛昱、文廷式、陈锐、王鹏运、郑

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皆社人也^[13]。

此后，他们还组织参与了“咫村词社”、“校梦龛词社”等，经常组织聚集社友、词友活动，吟咏唱和，声势日隆。王鹏运还热情邀请其他词友入社，朱祖谋曰：“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重至京师，半塘翁时举词社，强邀同作。翁喜奖借后进，于予则绳检不少贷”；夏孙桐曰：“丁酉、戊戌间在京师时，从王半塘、朱古微游，强拉入社，所作甚少，稿亦多佚。”^[14]郑文焯亦如此，“时王佑遐给谏举咫村词社，邀先生入社，朱古微侍郎、宋芸子检讨皆当时词友也”。^①由此可见王鹏运组织词社之热情，况周颐亦如此。《蕙风词话续编》卷二第 54 则载：

囊与晓珊、半塘，约为词社，月祝一词人，合为一集。嗣晓珊有湖北之行，因而中止。考出词人生日，录记于此，它日克践斯约，尚当补所未备。

这些词社及其士人会馆为临桂词派词人聚集提供活动平台，使之成为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条件。

其二，以王鹏运、况周颐为领袖与核心形成临桂词派团体，符合文学流派具备旗手领袖条件的特征。夏纬明指出：

清光绪时词坛人物甚盛。京师自端木子畴、许鹤巢、王半塘、况夔笙等有《薇省同声集》之后，一时兴起者众。而以半塘为领袖，如朱古微、张次珊、宋芸子、刘伯崇等皆社中坚^[15]。

桂籍词人经常聚集在王鹏运的京师寓所“四印斋”，唱酬无虚日，尊其为师长、兄长、长辈等，自觉接受王鹏运指导、引导和领导，形成粤西词人在京的文学圈子。况周颐自蜀进京进入“四印斋”“宣南词社”后，与之以“四中书”词人之名声也享誉京师，成为这一圈子核心及其领袖之一。王鹏运与况周颐均为广西临桂人，志同道合，结为知己。《兰云菱梦楼笔记》载，王鹏运逝世后，况周颐十分悲痛，所撰挽联云：“穷途落拓中哭平生第一知己，时局艰危日问宇内有几斯人。”况周颐将王鹏运引为“知己”，可谓临桂词派双璧，更有利于共同创建临桂词派。王鹏运、况周颐词学成就卓著，与朱祖谋、郑孝臧被称之为“清季四大词人”（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清末四大词家”（蔡嵩云《柯亭词论》），均为晚清词坛领袖。

其三，志同道合，相互交流，唱和结集，著述颇丰，形成整体实力，具备文学流派的团体性、整体性、聚合性特征。临桂词派虽以地域——临桂命

名，但成员籍贯并非限于临桂及广西，其活动地域更非限于临桂及广西，主要以北京为中心，其后于上海、苏州，因其主盟晚清词坛，影响辐射全国各地。最初，王鹏运、况周颐词均编入《薇省同声集》，其后，况周颐编《薇省词钞》；其共同唱和词存《檠坞词存》、《蜩知集》、《琴思楼词》、《疆村词剩稿》等词集。王鹏运著有《半塘定稿》等，况周颐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等，构成临桂词派的核心力量和整体实力。

其四，将词学研究与学术研究结合，注重文献典籍整理及其文献研究方法应用，体现临桂词派的文学研究学术化特点。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文献典籍整理及其文献研究方法应用，强调“义理、考据、辞章”，运用朴学方法体现出实证性研究倾向，这对文学研究影响颇大。王鹏运指出：

词最晚出，其托体也卑，又句有定字，字有定生，不难按图而索。但得孤证，即可据依，此其易也。然其为文也，精微要眇，往往片辞悬解，相饷在语言文字之外，其非寻行数墨所能得其端倪者，此其难也^[16]。

在王鹏运校勘影响下，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邓鸿仪、冯煦、缪荃孙等都十分注重词学文献典籍的整理校勘，临桂词派的文学研究由此具有学术化特点，从而也体现出文学流派学术化特点，注重从校勘、注释、版本、目录、选编、辨正等文献整理角度强化了实证性学术之风，在词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王鹏运拟定校勘五条准则：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是王鹏运近二十年校词方法和方式的总结”^[17]。王鹏运整理刊印《四印斋所刻词》、《四印斋宋元三十家词》；况周颐整理编纂《粤西词见》、《薇省词钞》等，构成临桂词派在文献典籍整理和文献研究方法的成就和特色所在。

其五，具备词派宗旨、纲领及其理论体系。王鹏运提出“重拙大”之旨，可谓对词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况周颐《蕙风词话》从词学理论上进一步系统阐发这一观点，使之成为临桂词派的宗旨和纲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词学理论体系，系统论述词境、词心、词体、词格、词法、词径、词律等词学理论构成及其结构，从本体论、源流论、作者论、创作论、方法论、作品论、接受论等理论构成角度构成理论体系，为词学理论实践总结和集大成。蔡嵩

^① 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民国铅印本，转引自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0 页。

云曰：

论慢词，标出重拙大三字境界，可谓目光如炬。其《蕙风词话》五卷，论词多具卓识，发前人所未见^[18]。

《蕙风词话》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被誉为“清末三大词话”，赵尊岳《蕙风词史》称“词学渊粹，为世宗尚”^[19]。临桂词派因《蕙风词话》拥有词派理论，具有雄厚的词学理论基础和词派纲领，作用影响和意义更大。

由此可见，临桂词派在词学史及其晚清词坛的地位显而易见，在晚清词坛处于主流和主盟地位，集中体现出文学流派在清代词学中的作用和影响，也体现了临桂词派作为文学流派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M].苏州：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
- [2] 叶恭绰.清名家词序[M]//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1982.
- [3] 陈匪石.声执[M]//词学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4970.
- [4] 张宏生.清词研究丛书·总序[M]//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 [5] 蔡嵩云.柯亭词论[M]//词学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4908.
- [6] 徐珂.近代丛话[M]//唐圭章,编.词话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4224.
- [7] 同声月刊[J].第一卷第十号,1941(9):1.
- [8] 叶恭绰.广籞中词：卷二[M]//御选历代诗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642.
- [9] 谭献.箇中词：今集续卷四[M]//御选历代诗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596.
- [10] 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1.
- [11] 况周颐.蕙风词话[M]//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 [12] 况周颐.词学讲义[J].词学季刊,创刊号:109.
- [13] 王易.词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420.
- [14] 夏孙桐.悔龛词序[M]//夏志兰,夏武康,编.悔龛词笺注.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200.
- [15] 夏纬明.记苏州鸥隐词社[M]//张伯驹.春游社琐谈.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72.
- [16] 王鹏运.梦窗甲乙丙丁稿跋[M]//四印斋所刻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90.
- [17] 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7.
- [18] 蔡嵩云.柯亭词论[M]//唐圭章,编.词话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4914.
- [19] 赵尊岳.蕙风词史[M]//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68.

On the Posi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Linggui Poetic School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ic Schools of Qing Dynasty

—— Serial Research on Linggui Poetic School (V)

ZHANG Li-q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lin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Linggui Poetic School needs to be defined in comparison with Zhejiang Poetic School and Changzhou Poetic School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ird period of great development of Qing Dynasty, and also to be defined in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times with different poetic schools and institutions in late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compositions of the literary schools such as origin, name, leadership, team, motif, creed, and theory, can we know that Linggui Poetic School had exceeded Zhejiang and Changzhou schools and had brought forth new innovation. Therefore,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o the value function,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Linggui Poetic School as a literary school.

Key Words: Linggui Poetic School; Literary School; the Third Period of Poetry in Qing Dynasty; Motif and Creed; Position of Poetic Study

[责任编辑 江 剑]